

论迟子建小说文本的新开拓*

秦殿启

(盐城工学院图书馆,江苏 盐城 224003)

摘要:迟子建的小说文本钟情于历史,并吸纳了新的方法。尤其是有关“文革”史与伪满洲国历史的文学表达,作者擅长构建独特的人文视角,从日常生活写起,运用民间立场,书写平凡的生命个体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的真实感受,显示了新历史主义小说的书写策略。

关键词:“文革”史;伪满洲国历史;民间立场;新历史主义;人文视角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06)04-0058-04

迟子建(以下简称迟)的文学创作和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以及西方新历史主义的蔓延是同步的,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文艺思潮其思想内涵和基本特点主要体现在“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单线历史的复线化和大写历史的小写化;客观历史的主体化和必然历史的偶然化;历史和文学的边缘意识形态化”^[1]。迟的童年阶段恰逢“文革”时期,家庭的遭遇和身边的文革记忆在幼小的心灵深处留下了难忘的印记。对“文革”的书写态度上,迟说“伤痕完全可以不必以声嘶力竭的呐喊和展览显示其痛楚,它可以用很轻灵的笔调来化解。”^[2]用新历史主义的话语来描述,那就是中心历史的边缘化,大写历史的小写化,客观历史的主体化,把一些历史碎片的回忆贯穿在现时的文本叙述中,使文本具有鲜明的历史性。

“历史是日常的”,这是迟看待历史的一种视角和“用民间立场书写历史”的思路。以满洲国为例,要想把它“还原到历史状态,其实就是柴米油盐婚丧嫁娶,当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也有民族仇恨,而它是隐藏在日常生活中的,是漫不经心的。”而且写“悲痛和屈辱用看似平淡的日常途径作为切入点更有深度。”从而“不动声色地把时代悲痛溶入老百姓的喜怒哀乐之中,通过整个人物的描述而令人感动,这才叫真正的史诗。”^[3]如此看来,这种把历史融入日常生活,用描写日常生活来关照历史的做法,是对官史历史观与主流文化

立场的策略反叛,而代之以野史、稗史与民间史的视角,这正是迟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基本特征。

一、家族史的描述与民间立场的选择

1、家族史的描述。迟对“文革”有着特别的情结,对“文革”历史的描述摆脱了正史的一元性,“逐渐为野史的多元化和多层次性消解,以一种反向性思维消解真实的历史链条。”^[4]这种反向思维落实在具体的作品中,那就是以真实历史的主体承载者所遭遇的切身感受和真实变故来表达。在《北极村童话》中,通过天真无邪的童年话语、生命终结的死亡话语以及带有时代气息的“文革”话语进行了微妙的表达。故事以一个七岁女孩的记忆,感受到大人对“童言无忌”所做出心惊胆战,以碎片式的穿插讲述了姥爷挨斗、大舅在文革中死于异乡的精神痛苦。“文化大革命基本上(至少在指导思想)仍在理智的主宰、支配,所以对情感和人性的扭曲也是通过理智来进行的,正是这样,造成了精神上的极大苦痛和心理上的无比折磨。”^[5]《原始风景》是作者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上对自己家园、家族、亲人的一次童年生活的回忆,是一篇放大的“北极村童话”。

迟对“文革”历史的化解落实到家族史的描述上,削弱了官方历史的政治话语,强调了历史的“诗性”——虚构性、创造性和权利性。为此,“小历史”(Histories)代替了“宏大正史”(Grand histo-

* 收稿日期:2006-02-28

作者简介:秦殿启(1969-),男,陕西韩城人,盐城工学院图书馆馆员,文学硕士,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及情报学。

ry)。《花瓣饭》以童年视角描述了发生在文革期间一个家庭一顿晚饭的美丽故事。在小说中,童年的天真掩盖了大人内心在那段特殊时期的伤痕与恐惧。文革要求人们从理智上运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分析、判断一切,要求人们“分清敌我”,“划清界限”,小说中父母的宽厚与仁慈和子女的自私与无知形成对照,这顿用鲜花点缀起来的花瓣饭,就是作家用以表达其父母爱意与温馨的象征。从家族史的书写策略对历史的描述言,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与迟对人性之光的挖掘有所不同,尤其是侧重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上,如小说中孙李两家的世代仇杀即是。

2、民间立场的选择。迟对历史的文学表达致力于把大题材用最日常的民间的立场表达出来,《满洲国》依照“伪满洲国”14年(1932—1945)的历史巧妙地构思为14章,每一章以四种计时方式并列排出并作为章名,即公历纪年、民国纪年、日本天皇年号纪年、“伪满洲国”皇帝年号纪年。这种编年体方式书写历史的文学显示了迟对历史的尊重,同时这种多元化记年在文学上的创新利用,突出了这段历史的复杂性、特殊性和沉重性。小说的切入点选择了长春街头一个弹棉花摊,并通过充满了儿童天性的九岁的男孩吉来的活泼好动为引子,用童年视角,以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为切入点展开了这部长篇历史小说的创作。作者特意让小人物来说历史,把“伪满洲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融入到小人物的命运中去,通过写历史的一个片段,并把人物放进去,鲜活地表现具体历史事件,加之喜怒哀乐,生死离别等情感经历的纵横交织,在浓郁的地域色彩和乡土人情的历史底蕴下闪烁着人性之光,渗透着人文情怀,显示了迟民间视角下文学对历史的一种“激活”。以1932年秋的平顶山大屠杀为例,迟在此安排了一个很有利的地点和人物,即已嫁到平顶山两年多的吉来的姑姑美莲,从而获得了最佳的自然视角和人文视角。通过美莲一个人的视觉、听觉、感觉等的再现描述了这次大屠杀的全过程。《满洲国》是一个场面宏大、人物众多的大作。但作者着笔的重点是形形色色人物的日常生活在这段特殊历史时期的真实再现。于是,像杨三爷等重利贪色之人,刘秋兰等老实本分之人,王恩浩等吃穿不愁之人的为人处世的生活场景得到了激活,显示出民间立场下的历史真实,反映了历史本身的多元化,并通过历史与文本的互动,显示出文本的历史性和历

史的文本性。

二、村落史的描述与边缘策略的利用

1、村落史的描述。用村落史的描述来反映文革历史,是大历史向小历史的一种回归。在《沉睡的大固其固》中,作者内心含着一种触摸它神经的激动而疼痛的感觉。小说中的“样子墙”就是文革伤痕的见证。在如何化解这段难忘的“伤痕”上,作者巧妙地借用大固其固的故事:小鱼为了成长,为了成熟,必须游出小河,穿越大江,投入海洋。这是生命的经历,也是对生命的考验。迟在这里侧重表现文化、人性与生存范畴中的历史,这无疑表现了是新历史主义小说的最重要的特征。但迟的描述是如此微妙和宽容,和莫言的诗性话语形成强烈对比,《红高粱家族》以“家族史”、“村落史”为重彩突现了抗战时期山东高密东北乡血雨腥风的悲壮惨烈,尤以“红高粱”意象唤醒了人类的原始野性,夸张而不乏直白和胆魄。

在《越过云层的晴朗》中,迟采用独特的拟人化叙述视角,用一条跟随过六个主人的狗做“叙述者”,借用狗的眼睛来观察和记录世态人生,把文化大革命及改革开放初期的重大事件融入日常生活的平淡叙述中。在黄狗的六个主人中,富有悲剧色彩的莫过于小哑巴、梅主人和文医生,而这三个人都是“文革”的受害者。在揭示“文革”伤痕的痛楚上,阿黄的作用在于“人不能知道的真相,我却能知道,只因为我是一条狗。”极具想象力地揭露了人类的另一个侧面“人是多么的残忍和虚伪啊!”通过这种想象,作者鲜活地再现了那段历史时期的一个个生活画面。这篇围绕东北金顶镇一带的历史变迁所表现的人性生存范畴的村落史,用一些穿插性的历史碎片,深刻反映了“文革”历史在人们心中抹不掉的伤痕,“它着眼于历史的局部具体性与个案生动性,在一角一隅、半鳞半爪中让人感知其沧桑变迁、世事轮回,由此而触摸到历史那无处不在的宿命力量与悲剧逻辑。”^[6]

2、边缘策略的利用。边缘策略包含有关关注边缘人物、撷取边缘史料、采用边缘立场、得出边缘结论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策略及书写策略。边缘策略的应用使得伪满洲国历史的描述更细致。它渗透到农村最普通的平民百姓的日常起居,它关注到城市中的阴暗角落,它牵连到抗日战场上某个无名小卒。在书写农村及游击战场景的选择

上,迟主要通过一些弱小而特殊的小人物如土匪胡二、小工杨浩、小乞丐狗耳朵、小战士杨路等人作为人文视角的选择对象,通过他们曲折奇特的、充满伤痛的情感经历关照东北乡村的游击战场的艰苦惨烈的战斗场景和农村的集团部落监控下的苦难生活场景。通过这些场景的生动描述,显示了作者对边缘人物的关注,对边缘史料的利用。棺材铺子、寺庙、秧歌会、油郎乡医、集团部落等成为很有代表性的人文视角窗口。在书写城市场景的策略上,迟对烟馆、妓院、当铺等给予了重视,通过一些凡夫俗子、土匪、乞丐、地主、娼妓、嫖客等的另类生活来展示这段特殊历史时期的这些边缘人物的日常生活图景。边缘立场不但贴近生活,而且更加关注人性,因而更能增强历史的文本性;而大量真实确凿的历史片断的穿插,又使得文本的历史性突现出来。

三、心灵史的描述与人性情感的书写

1、心灵史的描述。心灵,一方面指思想与感情,在佛教中又指人的意识、精神。用心灵史来描述个体生命在“文革”史中的思想与情感遭遇,包括人的意识及精神境遇,是迟新历史主义小说一种表现方法。《北国一片苍茫》运用现实叙事和梦幻般回忆相结合的方式讲述了乡村女教师芦花童年时期复杂凄惨的家事。就新历史主义小说而言,历史话语一旦形成,首要遵循的不是历史过程的逻辑,而是话语自身的逻辑。在《麦穗》中,迟主要运用知青话语来讲述“文革”对知青以及年幼的学生产生的伤痕。小说塑造了一个清纯、懂事、宽容的女孩西西的艺术形象,“文革”给幼小西西的心灵留下的不幸,同时也看到了上海知青图画老师情感的不幸,一种悔恨难平的伤痕永远留在了其心灵深处。

迟借助文学为逝去的时代留下了心灵史诗,游刃于丰富的史料,并以主体心灵去激活,力求达到与历史交融。《树下》以“文革”为背景,倾注了作者童年的生活体验和青春期那种浸透着忧伤的浪漫。小说的着笔就是给卑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写的一部心灵史。从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的基本人性的角度上,俯视这个甚至有些无聊、荒唐的世界,写出人的欢乐和忧伤、希望与无奈,展示出一种生的喜悦与死的悲凉。同时,作者又用轻灵的笔调通过知青话语、“政治问题”话语记载着文革的伤痛。迟的表述特色是一种片断式的,把“文

革”作为一个比较含蓄冷涩的背景,在纵横的时空坐标下借着童年生活及一些情感故事的穿插回忆中印记着历史,表现了生存个体的偶然与特殊历史的必然,以及在客观必然环境下,个体生命的弱小与无奈。

迟笔下的“文革”有别于“伤痕文学”的直接而完整的表达。卢新华的《伤痕》,讲述了“69届”初中女生王晓华为“革命”与被批为“叛徒”的母亲彻底决裂,并提前毕业和高年级的同学从上海市插队来到辽宁渤海湾农村劳动、入团、工作、恋爱的艰辛与曲折的痛苦生活。王安忆对“文革伤痕”的表述也是全面的、整体性的。写于80年代初的中篇《墙基》,借上海499弄和501弄两个贫富对比明显的弄堂中生活的人们在“文革”整个过程中的批斗变故,对“文革”进行了否定,并带给读者以深沉的思考:“墙基,还在,横着。高出地面一二厘米,固执地沉默着。”^[7]池莉更加重视知青话语的回忆,在幽默的叙述中不乏讽刺性的批判。写于21世纪初的中篇《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以第一人称“我”回忆了几位初中毕业生从加入知青大军上山下乡到知青返城的完整过程,描述知青生活的心态和情感遭遇,鲜活塑造了纯真的少女知青豆芽菜和虚伪的青年知青书记关山这两个艺术形象,表现了文革中的知青的内心的沉重和伤痕。这种描写既突出了“文革”过程的完整性,又表现了主人公在“文革”过程中的参与性,对“文革伤痕”的表达更直接,更尖锐,反思、批判和否定的口气也更明朗。

2、人性情感的书写。《满洲国》人性之光的发掘是不分民族、职业和阶层的,在小说涉及到各个角落和各类人群,人性中的善良、真诚、朴素、智慧、信念等内涵得以鲜活的再现。尤其以人性之光中最为突出的爱为脉络,围绕情感遭遇得到深切的表现。迟说过“世上的路有两种,一种有形地横着,供人前行、徘徊或者倒退;一种无形地竖着,供灵魂入天堂或者下地狱。在横着的路上踏遍荆棘而无怨无悔,才能在竖着的路上与云霞为伍。”^[8]这是生命的运动之路,是人性的表现之路,也是作者对灵魂的探索之路。人的情感经历占据了小说主导地位。从一对半圆的铜镜说起,铜镜在我国已有4000余年的历史,它不但承载着中国的传统文明,而且是中国文化的一种重要象征。从当代长篇小说叙述特征看,以伪满洲国这段特殊历史时期为背景展开的宏大场景的话语主

题里,铜镜显然被作者赋予了“勿忘国耻”、“以史为鉴”的象征意义;两半铜镜分别代表中国版图上的东三省和东三省以外的版图,其分开暗示着日本武装占领东三省,扶持傀儡政权建立伪满洲国,东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流离失所。其合并代表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东北版图重新回到祖国。在这铜镜里面有的不只是人文情怀,各类人物与灵魂之间的碰撞也深深蕴涵在其中。有关铜镜的话语在小说中除了隐语和象征外,还是贯穿小说情节发展的线索。一半铜镜照耀着抗日游击队的艰苦不挠的战斗足迹;一半铜镜反映着难以摆脱世俗的民间角落。铜镜的离合叙说着抗日的曲折悲壮,也叙说着伪满洲国里百姓的辛酸忍耐。两半铜镜的最终合并,巧妙回答了一段辛酸历史的结束和抗战胜利的喜悦。

男女之爱是情感经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迟让爱的力量在对比、升华中,使读者深刻感受到人性中的宽容、仁慈、善良、忠厚、真实,更深刻感受到乡土之情、祖国之情、民族文化之情的魅力和生命力。胡二和紫环的情感经历则证明了在这段特殊历史时期,富有人情和野性的匪徒也

远远胜过了丧失民族自尊的民族败类和叛徒。王亭业、郑家晴等人的情感经历及不幸遭遇则是伪满时期一部分性格软弱的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他们痛恨日军,又胆小怕事,他们有革命的动机,又缺乏必要的斗志和勇气,从而演变成为历史的牺牲品。吉来和王小二是作家着力塑造的两个重要形象,通过对他们的情感历程的描述,把长春、哈尔滨、沈阳连为一体,构建了迟笔下极好驾驭的三点一面的人文视角,把东三省的伪满版图尽收眼底。北野南次郎和中村正保是小说中两位重要的日本军人形象,前者是日本细菌部队的研究成员,热忠于细菌人体实验的刺激和喜好发泄兽欲的快感;后者是日本派驻在伪满东部的开拓团成员,他的情感经历尽管付出了温柔、体贴,表现出了父爱及人性的光辉,但却遭遇着难以安慰的痛苦和悲剧。在《满洲国》里,主体情感的密集渗入使历史的偶然性突显出来,使迟文学创作的主题——“人性之光与人文情怀”突现出来,体现了迟小说文本对历史描述的尺度与策略,并与正史话语及传统历史小说的宏大叙事形成鲜明对比,显示了迟子建小说文本与历史互动的新开拓。

参考文献:

- [1] 张进. 新历史主义文艺思潮的思想内涵和基本特征[J]. 文史哲, 2001, (5): 26-32.
- [2] 迟子建. 越过云层的晴朗[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3: 284.
- [3] 迟子建, 闫秋红. 我只想写自己的东西[J]. 小说评论, 2002, (2): 28-31.
- [4] 王岳川. 中国镜像: 90年代文化研究[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260.
- [5] 李泽厚. 中国思想史论[M].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9: 1021.
- [6] 张清华. 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M].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7: 209.
- [7] 王安忆. 王安忆中短篇小说集[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3: 88.
- [8] 迟子建. 迟子建[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2.

On the New Development of Chi Zijian's Novel Text

QIN Dian - qi

(Library of 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Jiangsu Yancheng 224003, China)

Abstract: Chi Zijian's novel text closely relates the history, and has taken in the new method. In particular, in the text on "the Culture Revolution" or "Manchoukuo" history, the author excels to construct the unique information humanities perspective, writes from the daily life, the utilization folk standpoint, writes the ordinary life individual under the special historical environment real feeling, has demonstrated the new historicism novel writing strategy.

Keywords: history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 history of "Manchoukuo"; folk position; new historicism; humanities angle of view